

編後語

《二十一世紀》於1990年10月創刊，以中國的文化建設為使命。為慶賀出版三十周年，本刊一如往常製作特大紀念專刊，邀請近二十位編委惠賜鴻文，結集成「慶祝創刊三十周年論叢」，以誌其事。除了少數幾篇文章談及當事人與本刊的種種因緣與點滴回憶以外，無獨有偶，大部分文章的焦點，基本上都是從「後疫情時代」中國與世界何去何從這條主線展開不同方面的討論：中國傳統的防疫管理；當下新冠肺炎疫情與民粹、種族和民族主義的關係；社會思想危機的深層因由；冷戰起源的回顧；國際政經格局的走向；「文明衝突論」的再思考；「中國模式」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的角色；知識份子在中國的文化建設中發揮的作用……不一而足。這些多角度、跨學科、開放性的探討，既符合本刊創辦的初衷——一家眾聲喧嘩的「茶館」，也側面折射出知識份子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，對於國事、天下事的憂心忡忡，紛紛從各自的專業領域條陳一己的書生之見，為這個大時代留下一份存照。

本刊創刊之初，最早設立且毫無疑義的欄目當屬改版前的「百年中國」；顧名思義，以反思百年中國走過的曲折道路為鵠的，也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瞻未來的寓意。本期刊出的三篇學術論文，無不牽涉共和國早期慘烈且深刻的歷史教訓。陳意新以安徽農村作為研究案例，指出大躍進時期反革命案件驟增的起因，與農民為求生存而進行集體性的反抗有關，主要發生在大饑荒最嚴峻的時期，絕非對政權存有反叛之心。張濟順以周恩來倡議並全程指導拍攝的電影《李善子》為中心，透過一部流產電影的戲劇性故事，揭示文化大革命前夜國內外波譎雲詭的政治、外交背景下，周恩來如何在「忠君」與「違心」之間苦苦掙扎。胡明輝探討的另一個文本故事同樣耐人尋味。中共早期領導人、作家瞿秋白臨終前留下的〈多餘的話〉歷來引起不少爭議，從國民黨時代作為反共宣傳工具到文革時期被視為「叛徒自白書」而廣為流傳，其爭議背後也離不開文革之初政治與權力的鬥爭。

今年的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紀念活動格外惹人注目。李文力基於宋崇書的《抗美援朝日記》，細緻勾勒了當年赴朝志願軍基層部隊接受思想動員前後的心路歷程，饒富學術價值。「天朝主義」是近年鬧得沸沸揚揚的一個話題，相關的討論紛繁複雜，門外漢往往不得其門而入，桑河對相關代表人物和文獻條分縷述，是一篇很值得推薦的導讀文章。文革與知青史的研究雖然汗牛充棟，但依然存在不少疑團尚待學者釐清，金光耀、董國強評論了兩部新近出版的外文專著，有興趣了解西方學術前沿成果的讀者，絕對不能錯過。